湘军史料丛谈

祁龙威

湘军是清季时代的产物，它对内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，对外反抗过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。它与数十年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均有关系。研究晚清史者不可不注视湘军史。但由于各种原因，以往我们研究湘军史的深度和广度，都很有限。寄望青年史学工作者，对丰富的湘军史料，要狠下功夫。

（一）

首先，要熟悉前人采辑湘军史料的经过。当湘军出世不久，其统帅中即有人设局采辑史料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末即发起编《忠义录》。方宗诚《柏堂师友言行记》卷三在叙述湖北首开书局刻《读史兵略》等后云："粤贼之兴，奏设忠义局，委官绅采访者，亦自胡文忠在湖北始"。《湖北忠义录》还不都是湘军史料。湖南继之，主其事者为绅士郭嵩焘。同治元年，郭与刘蓉书："《忠义录》一书，不难于编纂，而难于采访。在局数月，规模略定，而颇苦于采访之难其人，顷已属之罗研生""（岳麓书社版《郭嵩焘诗文集》一八一页）罗研生，名汝怀，湘潭人。他最终撰成《湖南褒忠录》。《云卧山庄尺牍》卷六录郭嵩焘之弟崑焘与刘蓉："罗研老在褒忠局数年，编成《褒忠录》三十余卷，小作结束"。这是编辑湘军史料的嚆矢。其书有同治十二年活字排印本。

同治十一年，湘军创建人曾国藩死后，由吴敏树、郭嵩焘、罗汝怀、曹耀湘等联名，为编《楚军纪事本末》而向各有关统兵大员征集案卷。这是又一次采辑湘军史料。吴敏树，字南屏，巴陵人，古文学家，他最早发起编湘军史。郭嵩焘致陈士杰书："湘军本末，宜有述录，发议自南屏"。（见《湘军志平议》）曹耀湘，字镜初，长沙人，曾国藩晚年幕客，其时正编辑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据《曾惠敏公手写日记》，《曾文正公年谱》实出其手。江西巡抚刘坤一于同治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对四人的倡议书的答复云："示示纂修《楚军本末》一书，洵为美举，正不独为辨谤而鸣功也。楚军与此次军务相为始终，兵饷兼筹，援防互用，其措施之精密，经营之艰苦，诚如来教所云，是为百世之规，可表中兴之业。倘烦椽笔，此书告成，所稗益良非浅鲜。江西办理军务奏疏咨行各件，已饬赶紧查抄"。（《刘忠诚公遗集·书牍》卷四）这些案卷集中在长沙，其后交给王闿运。

光绪初元，郭嵩焘出使英国后，曾纪泽、张自牧以编写湘军战史一事委之王闿运。湘军宿将李榕《复王壬秋孝廉》有："近日劼刚、力臣二君以长沙军事编辑属阁下"云云。（见《十三峰书屋全集·书札》三）旋由王闿运撰成名著《湘军志》。我在《〈湘军志〉钩沉》一文中，曾据《湘绮楼日记》等考证了《湘军志》的史料来源。其中文字资料有官书《剿平粤匪方略》和《剿平捻匪方略》等，有湘军将帅曾国藩、胡林翼、骆秉章等的专集，有同时人的著作：罗汝怀《湖南褒忠录》、秦湘业、陈钟英《平浙纪略》、赵烈文《平捻记》、黎庶昌、

曹耀湘《曾文正公年谱》、王定安《求阙斋弟子记》等。此外，王闿运采用了大量见闻和传说。如《湖南防守篇》记咸丰二年太平军攻长沙时，形容清军将帅惊慌失措之状云："鲍起豹居城南楼，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"。此事又见《湘绮楼诗·独行谣》自注："寇攻南楼，提督鲍起豹迎善化城隍神大像与对坐，人呼为鲍斋公"。按是时王闿运缒城入，在围城中，此系其亲历的记录，非官方公牍中所能见到的。其后王定安改撰《湘军记》，写此节也有"提督鲍起豹舁城隍大像置南城楼"云云，实即抄自《湘军志》。

继王闿运之后，努力采辑湘军史料的是朱孔彰。他是曾国藩晚年赏识的幕僚。他以曾国藩冠首撰《中兴将帅别传》三十卷。是书有光绪二十三年江宁刻本。又有光绪二十四年渐学庐石印本，改称《咸丰以来功臣别传》。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改订为八卷，称《中兴名臣事略》。其后中华书局将此书刊入《四部备要》。朱孔彰撰此书，为补国史之不足。《刘忠诚公遗集·书牍》卷十有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《复朱仲我孝廉》："昨奉惠书并承大著,高文典册，班马浓香，披诵之余，莫名纫佩。中兴将帅事迹，虽已先后宣付史馆，惟国史体例，必须登之奏牍，见诸明文者方准叙入。此外,逸事自多"如能博采周谘，拾遗补缺，足以表彰忠节，阐发幽微，以补史传所不逮，实为必不可少之作。"为此，朱孔彰曾采录了二百余种资料。他的《半隐庐丛稿》卷三有"中兴书目"一篇云："予撰《中兴将帅别传》时，所见书二百余种，国史官书而外，有抄本，有刻本，或未采录，或所纪有异同，兹略载其目，俾后人兼考焉。"其中不限于湘军史料，但偏重这方面，单是与湘军有关系的文人私著即罗列以下多种：

李元度：《天岳山馆文钞》
冯桂芬：《显志堂文集》
黎庶昌：《拙尊园稿》
孙衣言：《逊学斋文钞》
方宗诚：《柏堂文集》
何日愈：《存诚斋文钞》
杨彝珍：《移芝宝文钞》
杜俞：《元穆文钞》
程鸿诏：《有恒心斋集》
顾云：《盋山文稿》
吴棠：《望山益斋丛书》
何应祺：《守默斋丛书》
邓瑶：《双梧山馆文集》
薛福成：《庸庵文编》、《庸庵文续编》
洪良品：《龙冈山人文钞》
莫友芝：《郘亭文钞》
《史念祖文稿》
《张廉卿文稿》
陈玉树：《后乐堂文钞》

上述前人做过的采辑工作，为我们研究湘军史料，提供了内容和线索。

（二）

湘军将帅的专集是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。要了解其编纂状况，有助于评估其价值。

前人对《胡文忠公遗集》的评议不少。按胡林翼死后，由幕僚汪士铎等编辑其遗集。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复阎敬铭信："润帅遗集稿本已就绪否？此事端赖梅村兄为主，敝处事繁，恐编校不审。"（见岳麓书社版《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》）阎敬铭，正任湖北藩司，主持编胡林翼遗集事。胡林翼字润芝。汪士铎字梅村。《胡文忠公遗集》刊行后，曾国藩对其取材颇有微词。赵烈《文能静居日记》：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："师曰：'他日见《胡文忠集》,选多不当,且多代笔。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,足下何策以善其后？'""师"，即曾国藩。该书也经过删易。胡林翼门下士王家壁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四日《致胡莲舫方伯》："蓼山之役，文忠师军几不振，得阁下于万难措手之时，集二、三君子为之集饷，为之乞援，及罗、李诸公偕来，军资不乏而楚遂以复。文忠师入奏谓'筹饷之难，难于治军'。审当时情势，似非虚言也。刻文忠疏议者多所删易，殊不可解"。（见湖北人民出版社版《太平天国资料》）陈澹然《江表忠略》谓汪士铎等还故意不录胡林翼与王鑫的一批信。该书卷九《王鑫列传》："始林翼伟鑫才，书牍推鑫者数十篇，藏鑫子诗正所，编林翼书者摈焉。"

前人对曹耀湘等编的传忠书局本《曾文正公全集》的议论，也是不少。兹举数例：一是奏稿、书札的选材不当。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，曾氏门人吴汝纶为拟议重编《曾全集》复河东河道总督许振祎信："盛意欲删定《曾文正集》，此诚盛事，但鄙浅无学，不能究知文正深处，难胜重任。又此事未易急切整理。往年方存之所定本。吴清帅刻之天津者，但取在京时诸疏。后来在军，则专主论事，不存文字之见。鄙意方本甚善，但在外诸疏有不可录者，此又非通读全疏不能率尔定也。若今集中畿辅天津诸疏，则诚下走拟稿，不可以鱼目混珠也。书札中可存者较少，然亦有实为至文不在集中不可不编入。一人之见，恐不能尽厌人心，是以不敢草草应命。他日稍暇，或检点全集抄一目录呈是正可耳"。①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三日，吴汝纶又复许振祎书："文正公文集可汰者兹先附去一目，请酌定"。（以上均见《桐城吴先生尺牍》卷一）二是漏收《四象古文》一书。按曾国藩晚年撰文论专著，剖析古代名作，分属四象，故名《四象古文》，又称《古文四象》，盖口授吴汝纶者，《曾全集》未收录。其后吴汝纶撰《记《古文四象》后》，将是书编为五卷，单独刊行。（见《桐城吴先生文集》卷四）三是《求阙斋日记类钞》的选录无准。赵烈文《能静居日记》：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三日，"阅曾文正日记分类，王君原编。公日记甚多，固无全刻之理，然去取殊不易。此二卷精粹虽有，芜累亦重。"又云："日记予曾见十余册，如'品藻'一门当十倍之，此之去取，不知以何为准？"四是《求阙斋日记类钞》多错字。有刻本之讹。《曾惠敏公手写日记》：光绪六年八月初七日，"看先太傅《日记类钞》，错字甚多。信乎！校书如扫落叶，净尽实难也"。也有曾国藩手写本偶误，而《类钞》以讹传讹。薛福成《庸庵文外编》有《上曾侯相书》附记："同治乙丑之夏，科尔沁忠亲王战殁曹南，曾文正公奉命督师北剿捻冠，并张榜郡县，招致贤才，予上此书于宝应舟次。文正一见，大加奖誉，邀予径入幕府办事……按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：'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，递条陈约万余言，阅毕，嘉赏无已。'予在幕府，尝见文正手稿。近阅湖南刊本，归入'品藻'一类，而讹为伯兄抚

屏之名，想由校者之误，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，故并及之。”抚屏，薛福辰字。其实，曾国藩的手迹即误以薛福成为薛福辰。原文云：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六日，“阅薛晓帆之子薛福辰君所递条陈约万余言，阅毕，嘉赏无已”。其下文不误。六月初二日，“薛福成来一坐。”

骆秉章的奏稿次序凌乱，为王闿运所讥。《湘绮楼日记》：光绪七年闰七月四日，“和合处送《骆文忠奏稿》一部，内有误编者，盖其家唯案时月，不看年分之故。”和合，王闿运之弟。以我所见，光绪二十九年刊的《曾忠襄公书札》，也是前后凌乱，读者必须重为排比。

刘坤一生前即命人在新宁家中为之编集。《刘忠诚公遗集·书牍》卷十，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四日《复欧阳辅之》：“承示抄选敝稿，唯军务全录，此外则择其紧要者存之。至于例折，不过酌留一二。统费清神，与满舍弟商酌。底本错漏甚多，重烦校阅，尽可从容岁月，不必以一年为期”。同年七月十一日《复欧阳辅之》：“拙稿仰费清神，计已粗有头绪。陶弟来函，但言大略，其应如何编订，悉听卓裁。鄙意以为选就缓刊，以待盖棺以后。尝读曾左各集，兼录笺牍咨批。舍下旧笥中未审有此断简残篇，可采录一二否？”他的书牍等项，次序秩然，对年月日都一一交代分明，读者称便。

（三）

王家璧讥汪士铎等删改胡林翼遗稿，其实，这几乎是湘军将帅专集的通病。读者如以当时人引文或作者手迹与刻本对勘，便可发现删改前的原貌。兹各举一例：

罗泽南：《罗山遗集》卷二有“接左季高书”一诗云：“事业极伊吕，浮云过太虚。矧兹一战绩，已出二年余。世事知胡底，臣心敢负初。亢龙终有悔，珍重故人书”。按《郭嵩焘日记》：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，“校订罗忠节公诗文。忠节所著书，已刻者曰《西铭讲义》、曰《人极衍义》、曰《姚江学辨》、曰《读〈孟子〉札记》、曰《〈周易〉附说》、曰《小学韵语》。其子两明谋刻其遗文，属予校定也。其《军中草》有得左季高书一律曰：‘事业极尧舜，浮云过太虚。矧兹一战绩，犹未奠皇舆。世事知何极，臣心敢负初。亢龙终有悔，时展故人书。’忠节克武昌，与朱尧阶书曰：‘吾辈治兵，而君与筠仙、树堂筹饷，天下事乃取办吾辈数人之手。’盖偶以是为笑乐也。后九江水师挫败，季高乃援此信归咎忠节之骄功，故忠节诗云尔。”在这里，同是罗泽南为接左宗棠信而写的一首诗，刊本与《郭嵩焘日记》的引文歧异。盖郭嵩焘所见者尚是罗泽南原稿，而刊本已经他人加工。其中“犹未奠皇舆”一语，被改成“已出二年余”，抹去了本意。如果没有郭氏引文和注释，读者便很难明白罗泽南此诗的史料内容了。

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据原件排印的《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》中，有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《复李希庵》，其后附件颇有史料价值。“再，水师近日食洋烟者颇多，国藩昨有一咨戒饬之；又复厚庵一信申戒，兹抄呈一览，不审有所补救否？又行。”传忠书局刻本《曾文正公全集·书札》卷十二也录曾国藩给李续宜此信，但把暴露杨载福部水师腐败之状的附件删去了。这是中国社会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所校出来的。

湘军将帅的手迹与刻本互校，史学界的前辈已做了不少工作。陈恭禄教授所著《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》云：“李续宜后裔李思澄把曾国藩、胡林翼致李续宜亲笔手札钩刊，其中曾

氏全集未收录的约十分之五，胡氏全集未收入的约十分之六七。我们将集中所收书札和真迹本相对照，发现集中书札文句有不少的删改，李鸿章书札载于《全集·明僚函稿》，也有删改。郭庆藩所编《名贤手札》，有将文句删去成为空白者，盖有所顾虑而然。”按郭庆藩编《名贤手札》，全名《咸同中兴名贤手札》，光绪年间石印手迹，凡四卷。其中辑曾国藩、胡林翼、骆秉章、左宗棠、曾国荃、彭玉麟、沈葆桢、李鸿章八人给其父郭嵩焘的信，故又称《八贤手札》。一九六五年，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了《湘乡曾氏文献》，其中包括曾国藩、曾国荃、曾纪泽等大量书信手稿。一九六七年，台湾《书目季刊》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沈云龙教授的《〈湘乡曾氏文献〉读后记》。沈氏指出，曾国藩尚有不少家信未收入传忠书局于《曾文正公全集》外刊行的《曾文正公家书》和《家训》。但却富有史料价值。他又指出即使收入刻本的某些信件也已被删节失真。随着湘军将帅手迹的陆续出现，核校工作有待于继续。

（四）

对湘军将帅曾、胡、左等的著作要下功夫，对其中二三流人物的专集也不能忽视。以李桓的《宝韦斋类稿》为例，它是反映湘军在江西战事的第一手史料。李桓，字黻堂，湖南湘阴人，李星沅之子。太平军起义于广西后，清廷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，赴广西督师。星沅病故军中，李桓以父荫到京引见，咸丰五年以道员拣发江西，预闻军事饷事，官至布政使，署理巡抚。直至同治二年在曾国藩与沈葆桢相互倾轧中，李桓气病回籍。此书由李桓手定，刊于光绪六年。凡疏奏四卷、官书二十四卷、尺牍四十八卷、甲癸梦痕记六卷。《太平天国资料目录》：“内《甲癸梦痕记》卷八十四，记林凤翔就义详情。”按此系李桓的杂记，始甲寅（咸丰四年），迄癸亥（同治二年）犹如一线梦痕，故名《甲癸梦痕记》。其中虽有李桓入京引见时目击林凤翔就义时一鳞片爪的记录等，但其史料价值不如尺牍。李桓自咸丰七年起附存信稿，积六年得一千一百余首，按年月日先后编成四十八卷，相自序强承：“而此六年中江右全局情形略可见矣。”而《太平天国资料目录》的提示未引人注意及此。

对湘军将帅在野时的作品也要发掘史料。例如刘蓉的《养晦堂诗文集》，其中不仅有他作官时记录迎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等的重要书信，而且还有他回籍后哀叹湘军没落和湖南危机四伏的诗文。如《养晦堂文集》卷十有《与瑟庵从弟》一信云：“世局益坏而人情日竞于奢，不惟非惜福之道，抑虑其召灾速祸，而致琐尾流离之变也。十余年东南遭祸，举凡衣冠文物竞逐纷华之圃，无不残破，故家世族之所留遗，巨贾豪商之所积累，莫不荡为灰烬，化为飞烟，子女仳离，乞食道路。独湖南晏然无恙，吾乡又因此跻致名位，广积金钱，旧时凿井耕田之子，屠牛屠狗之夫，皆高牙大纛，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，果有功德在人，宜食此报以长保富贵而无后灾哉！”又《谕培基培垕》云：“闻此岁邑中宦家子弟，多好出入公庭，干涉词讼，意气相竞，骄奢相尚，闻之以为大戚。更有一种轻薄少年，佻达游荡，一挥千金，肥马轻裘，招摇闾里，此其破败在眼前，尤堪令人怆叹！”所云“邑中”，即曾国藩的故乡湘乡县。同书卷八《复蒋之纯廉访书》：“吾乡风会，盖运不如往时，厄运相乘，殆关气数，将来事变，恐不出一两年间，所冀年谷丰成，或可支延时日耳！”《养晦堂诗集》卷二，《喜温甸侯邑宰见过》：“湘山到处鼓鼙声，篝火狐鸣夜自惊。……蒲亭岂乏鹰鹯志，梓里长闻鹖旦鸣。”原注：“时值逆匪焚扰乡村，每夕击柝达旦，未尝安枕也。”“逆匪”，

指戈老会。按湖南之所以产生新危机，其根源在于湘军将帅升官发财以后，回乡大量兼并土地，剥削农民，连刘蓉本人也是这样。《养晦堂文集》卷八《复曾相国书》：“弟自还山后，旧所患苦，次第皆平，又以禄赐所余，薄市田亩，岁增粟千余石，举家不忧衣食。”这就是曾国藩所深虑的所谓“湘军暮气”的实质所在。

对近世外交家郭嵩焘的日记，评述者偏重于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（见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》第二辑），然而其中包罗了大量湘军史料，有待读者仔细钩稽。特别是关于湘军内部的一些矛盾。如关于战略上的分歧，《郭嵩焘日记》：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七日，“季高论皖围之非，以为一城而缀万七八千水陆之师，致皖南、江、鄂各处兵力皆单，极为有见。”可见左宗棠反对曾国藩、胡林翼围攻安庆。又如关于招勇上的分歧，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六日，“复意城信，因论李金旸瑞州太阳墟之败，言招勇是今日第一弊政，如何钰等并在县招勇，恣意妄为，此岂可恃以平贼耶！李金旸之视何钰，相去几何？养生人和平之气以挽回气数，必先留意于此。光武以匹夫定天下，所任为将帅者，如来歙、寇恂、贾复，多诚笃君子。邓禹、冯异于光武初起之日，仗剑相从，所至招徕安集。吴汉之贤，犹时以所部兵掳掠，反复申戒。罗忠节、李忠武之起，犹宁此义，故声名最著。今之论者，徒曰勇则授之，授之而又弃之，曾不为意，犹且曰，其勇可用也，勇者固如是也。苟如是而已，运劫之引而日长，正不知其所终极也！”按咸丰初元，罗泽南、王鑫师徒同招湘勇，其后各成一军。罗泽南及其后继者李续宾任儒生为营官，而王鑫则兼用农民军的叛徒，李金旸其一也。王鑫死后，李金旸续受湖南官方重用，保升至副将。咸丰十一年四月初，在江西瑞州，被李秀成捉放，湘军内部大震，故郭氏兄弟间有此通信。意城，郭嵩焘。是年五月，曾国藩以失律罪斩李金旸。

（五）

对台湾出版的《湘乡曾氏文献》、《曾文正公手写日记》②、《曾惠敏公手写日记》等，我们要下工夫进行研究。这里扼要评述《湘乡曾氏文献》。

一九六五年，曾国藩的后人将转辗运往台湾的一批珍贵史料交给学生书局影印，取名《湘乡曾氏文献》，共十册。一九七五年，又由学生书局出版《湘乡曾氏文献补》。《湘乡曾氏文献》的内容相当丰富，有大量曾国藩、曾国荃、曾纪泽等的书信，有曾国藩约一年时间的《绵绵穆穆之室日记》，有他对部下“密考”底本和察访记录，有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招降围攻天京湘军的谆谕，等等。其中大量曾国藩的家信以往都未公布过，例如他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与曾纪泽的一批信，以往都未刊入传忠书局本《曾文正公家训》。曾国荃、曾纪泽的家信和与人书，其中大多数也属初次发表，但却富有史料价值。例如，《湘乡曾氏文献》第十册所辑曾纪泽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给李鸿裔的信说：“弟家财存集成当铺者半，存它处者半。集成即九叔之业也。湖南典息甚轻，周年仅一分耳。买田获利，不过六厘，又远不如存典矣。故论利多，则存苏典为最，湘典次之，买田最下。论稳妥则买田为最，存湘典次之，存苏典又次之。兄舍重利而远求轻息，本不合算，所取者田土坚实，保无它虞耳。然亦不可太疑骤。弟回湘许久，而买田不过二百余亩，可知其不易矣。”③李鸿裔，字眉生，曾国藩得力幕僚，官至按察使。其时已致仕寓守苏州，见黎庶昌《拙尊园丛稿》卷四《江苏按察使中江李君墓志铭》。按曾国藩历来反对“起屋买田”，认为这是“仕宦之恶习”，他“誓不

为之”。见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《曾文正公手写日记》。但在他死后不久，曾纪泽也在家乡兼并土地，并放高利贷。《湘乡曾氏文献》提供了确证。至于以后曾纪泽在外国银行存银五十万，死后因无遗嘱而生纠纷，“不能无累于其身名”，见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二日《郭嵩焘日记》，则更非曾国藩意料所及矣。总之，湘军支撑了清王朝的垂危统治，却又制造更深刻的新危机，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，这是历史的辩证法，决非曾国藩一人所能挽回。

《湘乡曾氏文献》出版后，太平天国史老专家简又文前辈的最后一部名著《清史·洪秀全载记增订本》于一九六七年在香港问世，但还未及征引此书。至于《湘乡曾氏文献》在大陆的反应则更为迟缓。一九七九年，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未据该书辑录忠王李秀成壬戌十二年八月对围攻天京清军的谆谕。一九八二年，中华书局出版的罗尔纲氏《李秀成自述原稿注》，也未据《湘乡曾氏文献》征引曾国藩父子限三天赶刻《李秀成亲供》的书信等有关资料。一九八三年，岳麓书社出版《曾纪泽遗集》，仍是翻印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局刊本，未据《湘乡曾氏文献》增补。近年，大陆学界虽有应用此书者，但还很有限。有待于我们对之作深入的研究。

（六）

前人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，虽已作出巨大贡献，但未尝封顶。特别是对太平军的对手湘军史的研究，仅是起步。沿着前人启引的线索，首先在史料考证方面，我们大有可为。兹举对湘军悍将李金旸被李秀成在江西捉放一事的考证为例。

最早钩稽这节史料的是郭廷以。《太平天国史事日志》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日：“忠王李秀成自江西吉水渡过赣江，湘军副将李金旸（号冲天炮）溃退安福。”五月十一日即农历四月二日，“忠王李秀成部主将谭绍光、陆顺得、仁天安、蔡元隆及郜永宽等败清军于江西府阴冈岭、太阳墟，斩统领郭式源，擒副将李金旸。”五月二十一日即农历四月十二日，“湘军副将李金旸被擒不降，得忠王李秀成释放，本日至江西瑞昌到南昌。”六月十日即农历五月三日，“曾国藩斩失律之副将李金旸及张光照（因五月十一日之战，金旸本系太平军，前在湖南投降）。”对李金旸的来历，郭氏还不清晰。他原是天地会首领，不是太平军的叛徒。简又文《太平天国全史》几乎与《郭志》雷同。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十，“忠王大军自吉水一带渡过赣江。……湘军副将李金旸溃退安福。（按：金旸本太平军将士，前在湘降清，绰号‘冲天炮’。）”二十三日，主将谭绍光、陆顺德(认天义？)、蔡元隆（仁天安）及郜永宽等北攻临江府，不克。四月初二日，谭等捷于临江阴冈岭、太阳墟，斩统领郭式源，擒副将李金旸，所统兵十余营尽溃。忠王见金旸为勇将，有英雄气概，不肯归降，旋释之。（按：忠王供，金旸被擒，日期稍后，当是错记。上据曾氏《奏稿》卷十六，④《郭志》亦同此。金旸旋回南昌自首，被解至曾国藩大营，后于五月初三日以失律处斩。）对李金旸的来历，简氏也不清晰，也误以为是太平军的叛徒。罗尔纲《李秀成自述原稿注》始考明了其人其事。“李金旸，清朝副将（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毓科奏），绰号冲天炮，勇悍绝伦（据欧阳兆熊《水窗春呓》卷上），所以李秀成说他‘是勇将有名之人’。李金旸本是天地会员，在湖南起义，称统领元帅，后来叛变投降清朝（据王鑫咸丰五年三月初六日《永明剿贼大捷夺获富川县印信并各件请赍送广西省核收禀》，见《王壮武公遗集》卷三禀牍三）。阴冈岭战败被俘，李秀成释放他，走归江西自首。时狱未

定，左宗棠致曾国藩信说：‘江西于李金旸事，似颇难处。弟意欲其解送敝军了之，以除一患。此辈不用则杀，别无处置也’（原件南京图书馆藏）。后来江西巡抚毓科把李金旸解到曾国藩处，曾国藩就借失律把他处斩（据曾国藩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《李金旸张光照正法片》，见《曾文正公奏稿》卷十三）”。由于尚未见到《湘乡曾氏文献》、《郭嵩焘日记》等新出史料，罗先生未能说明李金旸事件在湘军内部引起的震动。为《李秀成自述原稿注》作补证，我撰《李金旸考》，钩稽史料几五千言。大抵前修未密，后来转精，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，对湘军史料的研究，也该如是。

---

①按刘声木《长楚斋随笔》卷八曾议曾国藩奏稿云：“其中实多系幕僚代拟之稿，曾文正公所亲为裁定者甚少。”“其幕僚如薛叔耘副宪福成言，奏议之稿，多非曾文正亲笔云云。吴挚甫京卿汝纶亦言，在燕之稿，多其所拟，未可鱼目混珠云云。”“外间多有自为选本以为瑞摩之用者。遵义黎莼斋观察庶关得昌，亦欲专选一本，商体例于吴挚甫京卿，京卿谓曾文正公奏议，薛副都福成选本最善，尽去他人之作及无失者，专存曾文正公奏议之真，即再选亦无加于此云云。见于吴先生尺牍中。”核之《相城吴先生尺牍》，颇有出入。受信人为许振祎，非黎庶昌。吴汝纶肯定的曾国藩奏疏刻本是方选本，不是薛选本。刘氏所言，未知何据？

②按徐珂《清稗类钞选》：“湘乡曾氏藏有《求阙斋日记》真迹，装以册页，得数十巨册，皆文正所手书。宣统纪元，携至上海，将付石印，中颇有讥刺朝政、抑扬人物处。或见之喜曰：‘此信史也。’意欲摘录，以卷帙浩繁而罢。及印本出，重览一过，则讥刺朝小、抑扬人物，皆删除净尽矣。”核之台湾学生书局影印《曾文正公手写日记》，较宣统元年上海石印本多两年日记。其余悉同。可证徐珂捕风捉影之说不足信。

③《湘乡曾氏文献》影印曾纪泽此信草稿，无受书人姓名及年月日，兹据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传忠书局本《曾文正公全集》所附曾昭六《曾文正公全集编刊考略》确定。曾氏后人当别有此信副本。

④当作《曾文正公奏稿》卷十三，其中有《李金旸张光照正法片》。《太平天国全史》失校。